

ZENG GUO FAN QUAN SHU.

曾  
国  
藩  
大  
传



曾  
国  
藩  
全  
书  
ZENG GUO FAN QUAN SHU



远  
方  
出  
版  
社

曾國藩大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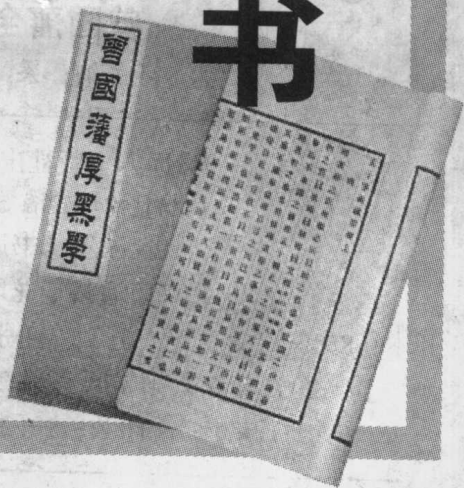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曾国藩全书

主编 梁勤

远方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张阿荣

## 曾国藩全书

主编：梁 勤

---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通县华龙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210.5 字数：5000千字

2002年7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套

---

ISBN 7-80595-769-X/K·27

定价：1980.00元



## 目 录

家世与人生 .....	( 1 )
湘乡白杨坪一户普通农家 .....	( 1 )
科场功名与人生态度 .....	( 3 )
京官十二载 .....	( 6 )
投师门仕途得意 .....	( 6 )
京师议政除弊利 .....	( 9 )
创办湘军 .....	( 20 )
墨经出山练劲旅 .....	( 20 )
改革营制成新军 .....	( 40 )
三年困境 .....	( 57 )
出师不利克武昌 .....	( 57 )
湖口惨败又奔丧 .....	( 71 )
安庆之战 .....	( 89 )
再次出山援浙行 .....	( 89 )
围攻安庆督两江 .....	( 97 )
攻陷安庆祝功成 .....	( 121 )
围困金陵 .....	( 132 )
三路进兵围金陵 .....	( 132 )
金陵告破斩头功 .....	( 149 )
剿捻受挫 .....	( 190 )
奉命剿捻败垂成 .....	( 190 )
师老无功回本任 .....	( 210 )





星陨金陵·····	(221)
中兴梦想终破灭·····	(221)
忍辱求和陨金陵·····	(232)
是非功过人评说·····	(248)
从理学家到洋务派·····	(248)
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·····	(272)





## 家世与人生

### 湘乡白杨坪一户普通农家

从湘乡县城南行一百三十里，在群山怀抱中，有一个史籍不名、舆图不载的小村庄，名叫白杨坪，清代属荷叶塘都。曾国藩就诞生在这里。曾家世代以农为业，称“自明以来，无以学业发名者”。其家世的详细情况，都记载在曾国藩所作的《大界墓表》、《台洲墓表》及《诰封光禄大夫曾府君墓志铭》中。

传说曾国藩出生时，他的曾祖父仍在世，梦见一条巨蟒，鳞光灿烂，自空中盘旋而下，直入曾宅，旋即闻报曾孙出世。这梦好蹊跷，或是巧合，或是附会，总之表现了曾家不甘久困，迫切光大门楣的愿望。曾国藩，原名子城，字伯涵。二十岁时，怀着满腔抱负和理想，自己改号为“涤生”，取其涤去旧日污垢，以求今日新生之意。后来科名顺遂，进身翰林，更立下澄清天下、藩卫家国之志，从此更名“国藩”。这种“天之降大任于斯人”的使命感，或许在孩提时代听讲蟒蛇转世的神话时，就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。

国藩的祖父曾玉屏（星冈公），“声如洪钟，见者惮慑”，为人刚正不阿。虽为“山野之民”，但颇有眼光和气概。其性格特点：强毅、严肃、谨慎、勤奋。在家人中，对曾国藩影响最大的



就是其祖父。祖父的话，总是响犹在耳：“尔的官是做不尽的，尔的才是好的，满招损，谦受益，尔若不做，更好全了。”曾国藩也总是将祖父所教的为人准则转教子弟：“吾家祖父教人，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，故男儿自立，必须有倔强之气。”他后来尊为家训的所谓八字诀（书、蔬、鱼、猪、早、扫、考、宝）和三不信（不信医药、不信僧巫、不信地仙），均出自祖父之口。

国藩的父亲曾麟书（竹亭翁），屡黜科场，应试十七次，到四十三岁才中了秀才。他侍亲至孝，积苦力学，柔而能忍，这些品性都熏陶了曾国藩。曾国藩也受到母亲的影响，他在致弟书中说：“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，其好处亦正在崛起。”

曾国藩因而逐步养成了自己的资质禀性。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行为是创办湘军，所作所为，就深刻地打下了家世出身的烙印。如，湘军募集，提出专用乡村朴实、诚笃而有土气的农夫，其油头滑面，有市井气，有衙门气者，概不收用；湘军的选将，提出第一要才堪治兵，第二要不怕死，第三要不汲汲名利，第四要耐受辛苦，治兵之才，不外公、明、勤三字；湘军训练，提出勤字为第一要义，教导部下早起、勤苦、忍耐饥寒；湘军作战，他生平最自夸的是“结硬寨、打呆战”，不辞劳苦，深沟高垒扎营，并竭力倡导“我不知战，但知无走”的顽强态度。这些做法，从个人性格上说，都可以追溯到在白杨坪家中所受的影响。

晚年的曾麟书命儿子国藩写了一幅对联，悬挂在厅堂上，云：

有诗书，有田园，  
家风半读半耕，  
但以箕裘本祖泽；  
无官守，无言责，  
时事不闻不问，







只将艰巨付儿曹。

曾国藩的前辈们，由农夫而士绅，一生碌碌无为，终老于白杨坪。而他们所倡明的家风，却实实在在哺育出一个能适应古老的农业社会，从而能左右中国政治大局的人物来。

## 科场功名与人生态度

道光四年，春暖花开季节，曾国藩头一次跟着屡试不中的父亲，从白杨坪乡间走出来，乘船到省城长沙参加三年两次的童子试。这一年，曾国藩仅十四岁。以后一连考了七次，到道光十三年，终于中了生员。翌年参加湖南乡试，中式第三十六名举人。接着入都参加会试。道光十五年，会试不售；十六年，会试再报罢。于是南下溯江而归，因意识到“生平功夫，全未用火猛煮过”，在归途中倾其所有全买了书，回家足不出户苦读了一年。道光十八年会试，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。之后是朝考，成绩极佳，列一等第三名，试卷进呈皇上，特别拔置为一等第二名，成了翰林。在翰林院刻苦攻读，几次大考翰詹，连连得捷，到道光二十七年，竟由考试途径一路晋升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。正如他自己所说的：“余生平科名，极为顺遂。”

清人朱克敬《瞑庵杂识》中有一记载：

曾文正公尝语吴敏树、郭嵩焘曰：我身后碑铭，必属两君。他任摭饰，铭辞结句，吾自有之。日：不信书，信运气。公之言，告万世。

这“不信书，信运气”之言，是有感而发的。曾国藩平日说过“吾生平短于才”、“秉质愚柔”、“称最钝拙”之类的话，虽是谦语。但他的天分确实算不上超等。秀才考了七次，会试也考了



三次，只取在三甲四十二名，赐同进士出身。然而他却异常幸运地点了翰林，而且在翰院大考中连连得捷。试想，假如他不是早得功名，而是被陷在百无用处的八股时艺中挣扎几十年，那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陋儒，哪有出头之日？又假如他中了进士之后，不是侥幸进了翰林，只是作为短资历、无背景的小京官或外官，靠心血浇灌的政绩来博取拔用，又哪能在短短数年间，凭考试晋身高位、当风云际会之时，以正二品的在籍侍郎身份来组织湘军、号召群伦呢？这中间确实有机缘巧合的因素。“不信书，信运气”，决非虚言。

曾国藩在致弟函中说：功名富贵，悉由天定，丝毫不能勉强。因而反复劝诫，科名有无迟早，都要坦然处之。他还说：这东西误人终身多矣，自己幸而早得功名，未受其害，不然，陷进去，最终成为无学无用之人。信中叮咛：靠得住的只有进德、修业。“进德，则孝弟仁义是也；修业，则诗文作字是也。此二者由我作主，得尺则我之尺也，得寸则我之寸也。今日进一分德，便算积了一升谷；明日修一分业，又算余了一文钱。德业并增，则家私日起。”

人生的意义决不在于科名仕宦，他在致弟书中说：如果以科名仕宦之有无来定贤肖的话，那么，李林甫、卢怀慎之流也是贤肖之人了。

因此，要将科名富贵看透。“若不能看透此层，则虽巍科显宦，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，我家之功臣。若能看透此理道，则我钦佩之至”。

曾国藩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，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谈科名与人生，并不是阻止他们进取，而是觉悟到：科名里面，有许多虚假误人的东西，又有许多机缘巧合的因素，是靠不住的。人生的意义应大于科名仕宦，因而希望自己的弟弟踏踏实实做学问，





在人生的道路上做个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人。

曾国藩总是力图用自己的人生观改造弟弟们，从这时候起就可看出端倪了。



## 京官十二载

### 投师门仕途得意

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顺利的。他于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中进士，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检讨，道光二十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，道光二十九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，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、工、刑、吏各部侍郎。十年七迁，连跃十级，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。对于生长深山、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，真可谓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变化如此之快，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。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：“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，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，由从四品骤升二品，超越四级，迁擢不次。”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，湖南“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”，“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，惟壬辰季仙九师、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”。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：“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，万顺店中徒步过从，疏野之性，肮脏之貌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，即知好三数人，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。”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，究其原因不外有二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，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，受其举荐。而后一条尤为重要。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，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，聪明



能干，要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，都是不可能的。所以颇为洞悉内情的王闿运就坚持认为，曾国藩的迅速发迹，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，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。

穆彰阿（1782—1856）字鹤舫，满洲镶蓝旗人，姓郭佳氏，翰林出身。他甚得道光皇帝信用，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。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：“在位二十年，亦爱才，亦不大贪，惟性巧佞，以欺罔蒙蔽为务。”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。

中国历代封建王朝，自秦以来即实行中央集权统治，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相同。唐及其以前诸朝，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。明清以来，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专决，相权也就不存在了。道光帝嗣位后，“尤虑大权傍落，必择谨善之士佐治，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”，而惟与曹振鏞、穆彰阿“有水乳之合”。曹振鏞“性模棱，终身无所启沃，人对但颂而已。又最忌士之有能者，稍出己上，必排挤之使去”。曹振鏞死后，穆彰阿继之，其“用人行事一遵其辙”。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，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，党同伐异，无所不用其极。鸦片战争时他打击抵抗派，陷害林则徐，极力怂恿道光皇帝对英妥协投降，就是施展的这种手法。“穆彰阿”自嘉庆以来，典乡试三，典会试五。凡复试、殿试、朝考、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、大考翰詹，无岁不与衡文之役。国史、玉牒、实录诸馆皆为总裁”。多年来，他利用衡文大权网罗党羽，培植亲信，遂致“门生故吏遍于中外，知名之士多被援引，一时号为穆党”。而对于不附于己者，则极力加以排挤。相传罗惇衍与何桂清、张芾同年中进士，主考官即穆彰阿，张芾、何桂清皆附于穆，而罗不肯；庶吉士散馆三人同得考差，罗又不肯去拜见穆彰阿，“次日忽传旨，罗惇衍年纪太轻，未可任衡文之任，著毋庸前往，另派某去。”其实当年罗惇衍十九岁，张芾十八岁，何桂清只有十七岁，张、何二人的岁数都比罗



惇衍小。据说，清朝“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”，仅罗惇衍“一人而已”。对于这次罕有的更动，时人皆认为系“穆所为”，并有“其权回天”之叹。

曾国藩的际遇与张芾颇为相类，只是时间稍后，机会来得也晚一些。曾国藩戊戌年会考中式，正总裁就是穆彰阿，二人遂有师生之谊，时相往来。曾国藩有几分才干，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，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，处处受到关照。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，穆彰阿为总考官，交卷之后，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该诗赋，曾随即回住处誊清，亲自送往穆宅。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。在此之前，曾国藩之秩品一直滞留未动；从此之后，则几乎是年年升迁，岁岁加衔，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，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。一些稗史曾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：一天，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，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。第二天到了皇宫某处，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，结果白白等了半天，只好退回穆宅，准备次日再去。晚上，穆彰阿问曾国藩说：“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？”见曾国藩答不上来，“穆彰阿怅然曰：‘机缘可惜。’因踌躇久之，则召于仆某，谕之曰：‘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，属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，此金为酬也。’”明晨入覲，则皇帝所问，“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。以是奏对称旨，并谕穆曰：‘汝言曾某遇事留心，诚然。’”从此曾国藩“駸駸向用矣”。曾国藩对穆彰阿也极为感激，穆彰阿被罢斥后，曾国藩每过穆宅，总不免感慨一番。二十年后，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前进京陛见时，还专程拜访穆宅。后来曾赴天津办理教案，恐自己再无机会进京，又专门写信，令其子曾纪泽再次前往穆宅，向穆彰阿的儿子萨廉致意。

道光三十年咸丰皇帝对穆彰阿的惩处虽然丝毫没有牵连曾国



回

藩，但却使他失去一个有力的后台。从此以后，每遇到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，皇帝身边很少有人为他说话，办起事情来也就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顺利。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十年间，清政府对他时冷时热，忽信忽疑，久久不愿把地方督抚大权交到他的手里，致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，处处碰壁，可能与此有很大关系。

## 京师议政除弊利

鸦片战争后的清王朝，就像《红楼梦》中连遭大劫的贾府一样，一下子塌了架子，暴露出老大腐朽的本质。与此同时，中国人民却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惊醒过来，开始注意世界发展大势，重新考虑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，以新的斗争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朝的封建统治。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，革命形势日益高涨，两广、湖南尤著先声。鸦片战争前，广州是中国的惟一对外口岸，不少物品通过湖南、广西运往广东；鸦片战争后，外贸中心渐次移至上海，广州贸易量减少，昔日运输线上的水手、驮夫等陷于失业。同时，鸦片战争时曾招募大批勇丁，战后骤加裁撤，也使这一大批人无以聊生。另外，这几省历来是会党活跃的地区，他们将走投无路的广大群众串联组织起来，不断发动反抗斗争，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亦起了推动作用。

当时形势发展最快的是广西。这里土瘠民贫，各族杂处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，本来就是容易发生起义和变乱的地方；再加上广东的大批失业群众沿江西上，到这里谋生；广东的小股起义军在当地无法立足时也向广西转移。这就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，形成一触即发的形势。同时，这里山高水险，地旷人稀，远离清朝的统治中心，是清政府控制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。派到这里的地



方官亦因油水不多，总想早点调离，遇事敷衍，不愿深究；甚至有意掩饰，蒙混不报。而当地士绅又人少位低，无力与地方官抗衡，不能起到监督作用。这样，在力量对比上就大大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。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对于广西的问题，清廷一无所知，地方官放任不问，地主士绅无可奈何，在统治阶级中形成群龙无首，一片混乱的局面。直到道光三十年夏天，由于不断有人上奏反映，清政府才开始发现广西局势不妙，下令将广西提督闵正凤革职，调派号称敢战的湖南提督向荣任广西提督，并派前云南提督张必禄赶赴广西，协助广西巡抚郑祖琛、提督向荣办理军务。同年十月广西士绅赴京上控，清廷进而了解到广西局势的严重性，立即将郑祖琛革职，派因病乞归原籍的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，驰赴广西，督办军务。不久林则徐病死赴任途中，清政府又改派在湖南原籍养病的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，前漕运总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，驰赴广西督剿会党起义。

这时，不仅广西局势如火如荼，广东、湖南不时发生起义，江淮一带和黄河两岸的会党、白莲教等也在积极活动，酝酿起事。总之，全国政治形势动荡不安，统治阶级内部人心惶惶，已呈现出阶级斗争的巨大风暴即将来临的种种征兆。因而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已经预感到情况的严重性，并开始筹谋挽回颓势的对策。这些人或者是下层官吏，或者是乡居士绅，或者是中小地主出身的书生，他们都置身于阶级斗争的前沿，体验深刻，明了下情，故能最先发现问题，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当时这类人物遍布全国，各省皆有，而尤以湖南最典型，最集中，其中不少人是曾国藩的好友，多年来一直与他保持着通信联系，不仅讨论一些学术问题，也时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，因而，学术观点和思想感情都比较接近。他们主要是刘蓉、郭嵩焘、江忠源、欧阳兆





回

熊、罗泽南等人。

刘蓉（1816—1873）字孟容，号霞仙，湖南湘乡人；郭嵩焘（1818—1891）字筠仙，湖南湘阴人。道光十四年十一月曾国藩赴京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刘蓉，道光十七年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，三人气味相投，遂成好友。江忠源（1812—1854）号岷樵，湖南新宁人，道光十七年中湖南乡榜，道光二十四年赴京参加会试，通过郭嵩焘求见曾国藩，二人一见如故，谈笑风生，江忠源遂拜曾国藩为师。曾国藩对江忠源非常欣赏，书札、家信中对他赞不绝口，称他是必诚必信的义侠之士、京中绝无的人才。江忠源非常注意自己家乡青莲教的活动，并暗中组织团练武装，积极进行准备，很快将雷再浩起义镇压下去。这就更加受到曾国藩的器重。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他奉旨荐举人才时，即将江忠源列名其中。欧阳兆熊字晓岑，湖南湘潭人。道光二十年曾国藩授官翰林院检讨不久就病倒在果子巷万顾客店中，病情沉重，几至不起，多亏欧阳兆熊的精心护理才没有死去，从此，二人成为好朋友。罗泽南当时还没有跟曾国藩见过面。道光二十四年因曾国华与曾国荃欲随罗泽南读书，咸丰元年（1851）起罗泽南又与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一起办团练，同曾家来往渐多，关系也越来越密切。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同贺长龄的女儿成婚，媒人就是正在贺家教书的罗泽南。曾国藩对罗泽南很尊敬，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，称赞罗泽南读书明大义，是邑中的颜渊，以不曾会面畅谈为憾。

刘、郭、江、罗以及欧阳兆熊诸人相互之间亦皆为好友，经常保持着联系。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把地方上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传给曾国藩，又由曾国藩反映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。这样，身为二品京官的曾国藩就充当了他们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代理人。

曾国藩对清政府的态度是矛盾的。首先，他拥护这个政府，

